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10 年 7-8 月（总第二十二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10. 7-8 —

E-mail: ias-fudan@yahoo.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一、学术成果	4
1、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6月（总第31期）出版.....	4
2、邓正来：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理想图景时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向 ...	5
3、邓正来：West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he case of legal science (1978-2008).....	10
4、郭苏建教授主编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Domestic and Global Political Impacts and Responses出版	11
5、文森特·鲁吉罗 著 顾肃、董玉荣 译：《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第八版）出版.....	14
6、顾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基础评析.....	16
7、纳日碧力戈：民族三元观.....	16
8、纳日碧力戈：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一个超级共同体的建设.....	16
9、纳日碧力戈：以言行事与符号“仿真”.....	17
10、纳日碧力戈：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人类学新篇.....	17
11、林曦：历史远未终结 社会主义进行时——读《社会主义转型》	17
12、林曦：英国《公司治理综合准则》述评.....	18
13、吴冠军：施米特的实证主义——考析《政治的概念》的方法论进路... ..	18
14、陈润华：顺与逆、古与今：清理地基（一）	19
15、孙国东：同意：从契约论到商谈论——简析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的合法化论说.....	19
16、孙国东：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20
17、沈映涵：建构“中国式”政治合法性	20
二、学术讲座	21
1、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五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	21
2、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陈弘毅教授主讲“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人权保障和民主发展”	25
三、学术会议	29
1、“合法性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9
2、“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与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34
3、复旦高研院“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第二期）”举行	38
4、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二届）举行	42

四、学术合作	44
1、秦绍德书记会见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副主席兰根霍夫教授.....	44
2、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47
3、复旦高研院与《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创办“西方大师看中国”专栏.....	48
五、学术出访	49
1、高研院一行出席“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49
2、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	51
六、学术信息	52
1、邓正来教授文章收录于《世界社会科学报告》（2010）	52
2、我院纳日碧力戈教授获 2010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53
3、复旦高研院 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结项答辩通知.....	54
4、复旦高研院 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结项答辩通知.....	56
5、复旦高研院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入围初选名单	57
6、复旦高研院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入围初选名单.....	59
七、媒体报道	61
1、【瞭望】大学教授进中学：奉贤中学的通识教育实验.....	61

一、学术成果

1、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6月（总第31期）出版

目 录

2010年6月（总第31期）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六）

崔涛 郭齐勇：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探讨

陈润华：顺与逆、古与今：清理地基（一）

本刊特稿：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论文）

编者按语

何慧丽、赵晓峰、魏程林：后税费时代的县乡关系与乡村治理问题——对中部某县的实证研究

刘春荣、桂 勇、陈周旺：“争议政治”的行为逻辑：对中国城市业主利益表达的实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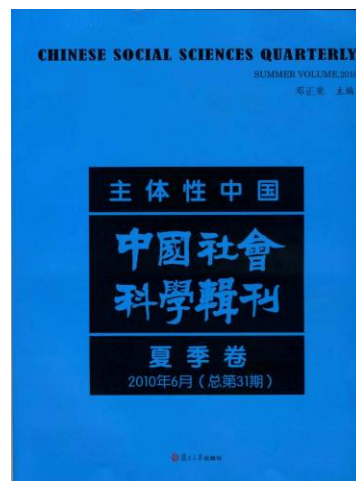
贺东航、朱冬亮、储建国：林权纠纷与林农抗争的底层政治研究

学术专论

邓晓芒：论“好像”（als ob）在康德哲学中的用法

谢华育：米塞斯和施特劳斯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批判

海外专论



道格拉斯·索斯盖特、威廉姆·麦奎尔：世界的粮食供给：农业发展的挑战

布鲁瑙·S·弗瑞，李杏果译：一个乌托邦？——无地域垄断的治理

罗纳德·贝蒂格，曹晋、池见星译：知识产权的元理论概述

书评思考

周 濂：哲学理论的可能性：评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

洪振强：近代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创新与突破——《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述评

韩亚栋：古典政治的终结与现代政制的诞生——评戈登·伍德《美国革命时期的代表制》

学者纪念

王铭铭：潘光旦先生《土家族源研究》导读

学者诗思

邓正来：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理想图景时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序言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2、邓正来：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理想图景时代”政治学研究的 转向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序言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顾名思义，是一套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专业性期刊。我们创办这份期刊，不仅是要引领中国政治学研究从此前的“政治科学”取向向“政治哲学”转变，更是旨在以政治哲学思维为基点为我所谓的“理想图景”时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和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理论资源。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不仅早已超越了邓小平所说的“赶快补课”的阶段，而且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并开始以村治等领域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初步发出了我们的声音。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政治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个在我看来亟需解决的倾向问题，即我所谓的“重技术、轻理论，重政治科学、轻政治哲学”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尽管我们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数个政治学二级学科，但即使是最具理论性的“政治学理论”学科也多是以政党制度、政府治理、基层民主等较浅层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取向的，完全欠缺对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根本哲学思考，即政治哲学思考。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此类研究的基本价值，但从我所谓的“理想图景时代”中国政治学所应担当的时代使命来看，我们必须实现一种根本取向的转变，即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变。

在其他场合，我经由长期研究已经指出：当下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即“理想图景时代”。我的这一主张是基于我对全球化的性质、全球化时代世界结构的性质以及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形成的。在我看来，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进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换言之，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这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即给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的能力。但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规则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据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

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¹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作为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正当性之规范性思考的一门学问,政治哲学在贡献“中国和世界理想图景”方面显然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按照我的理解,政治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为特定时空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提供据以辩护该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理想图景”——尽管“理想图景”的具体内容为何最终基于社会参与者的“重叠共识”形成并因而是开放性的。作为一种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问,政治哲学理想图景的形成必须基于对特定时空之现实或实践的“问题化理论处理”;换言之,它是对实践问题的前瞻性、规范性和评价性的考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政治哲学的这种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有助于形成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之生活的原则,而且助益于我们关于政治认同、文化身份等的自我理解,进而有利于我们在世界结构中形成我所谓的“主体性中国”。

具体而言,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来理解我所讲的“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变”。

第一,我们知道,16-17世纪建构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国秩序。但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虽说延续了数个世纪,却依旧不是一种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反思并考虑变革的问题。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思和变革的努力。换言之,在我看来,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时刻”,它试图把我们从既有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凭据的关于世界的整个哲学理念中解放出来,并“命令”我们去重新思考和批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种比“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更优、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种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这种全球化本身——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们所赖以凭据的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也在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之列。²

第二,后冷战时代所初步形成的这种全球化秩序本身其实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形成强制性支配的“世界结构”,而意味着国际法上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拯救中国,我们必须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对

1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23页;拙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等。

2 参见拙文:《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和开放》,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

世界结构支配关系的不平等性质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³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对后发国家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 16 世纪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我认为，当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当然，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主要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很大的程度上也不只是为了在世界中扩张和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作物品加以推行，并经由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除了能够在对外方面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⁴

第三，随着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等的降临，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型构的这种世界秩序正处于亟需调整的重要“时刻”。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是伴随着“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而登台、随着冷战结束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而主导了 1990 年代以来的世界秩序。但正如哈贝马斯所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随着朝鲜战争，‘新政’时期结束；随着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以及冷战结束，社会福利国家的议程宣告结束。随着布什时代的结束和新自由主义所吹牛皮的破裂，克林顿和新工党的纲领也走到了尽头。即将要出现的是什​​么？我希望，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要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那些在‘市场命令’下无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计划都必须经受审查。”⁵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大国和文明大国，中国理应从自己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普世性资源并以此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做出我们的贡献。事实上，就连 20 年前“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都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秩

3 参见拙著：《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221-253 页。

4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1-22 页。

5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赵光锐](#)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 年第 3 期。

序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主动承担起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显而易见，那种以研究国家治理术、政治统治策略、政党政治比较、具体政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和取向的政治科学是不能担当起政治学的这一时代使命的。我们必须对政治价值体系、国家的伦理诉求、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等更具前提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进而形成中国自己的但又具有普世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进而用政治哲学思维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并以此参与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讲的“政治哲学”绝不是与现实和历史不涉的纯理论思考，而毋宁是对特定时空之现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后所形成的理论形态；我所讲的“政治哲学”绝不是要介入当下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性争论，而毋宁是提倡一种以中国深度研究为基础、以中西政治哲学资源为理论参照的政治哲学研究路径；我所讲的“政治哲学”也绝不是要一般性地否认政治科学研究所具有的价值，而毋宁是主张形成一种政治科学以政治哲学为指导、政治哲学以政治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格局；我所讲的“政治哲学”甚至也不是要将严格限定为政治学的学科范围，而毋宁是主张对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进行跨学科的理论建构。

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转向”既需要中国政治学者的努力，更需要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学人的共同努力。也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创办了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专业期刊。我们拟先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待相关知识生产条件成熟，我们再将之改为季刊。在此，我们真诚欢迎诸位政治哲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为我们投稿，我们将严格依照学术标准遴选稿件，争取将该刊办成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窗口和品牌。

本期创刊号中，我们集中刊发了几篇罗尔斯研究的论文和译文。作为译者为《正义论》修订版撰写的译者前言，何怀宏教授的《一个精致的正义论体系：〈正义论〉修订版译者前言》一文对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思想以及该书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进行较为权威和系统的阐释，是我们进入罗尔斯理论之境的

6 《中央公论杂志专访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8/20/content_18368184.htm，最后访问于2009年12月1日。

向导。由邓正来教授翻译的 H.L.A.哈特名作《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与姚大志教授的《罗尔斯与自由的优先性》均是对罗尔斯关于“自由优先性”之命题的解读。其中，前者以 1971 年版的《正义论》为依据、以分析哲学为路径、以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为参照解读了该命题的丰富含义与可能缺陷，后者则以罗尔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为依据、以罗尔斯的理论发展为观照诠释了该命题的基本要义与理论价值。此外，钱永祥教授的《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一文从多元论和美好生活两个议题入手，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顾肃教授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基础评析》一文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流变和缺陷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刘清平教授的《正当为何必要？——论正当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功能》一文则从中西理论资源为依据在论证“正当”具有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功能的基础上，重新论证了“正当优先于善”的命题；萧高彦教授《西耶斯的制宪权概念——一个政治理论的分析》从政治/法律和社会/政治两个层次对西耶斯“制宪权”概念进行了较令人信服的解析；包利民教授《现实主义、价值认同与理性的力量——从“米洛斯对话”谈起》从阅读第一个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家修昔底德的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入手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质和目的进行了新的阐释；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和吴彦博士撰写的《施密特的实证主义》、《同意：从契约论到商谈论》和《康德法律哲学的两种阐释路向：起源与基础》等则分别对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和杰里米·墨菲的《康德：权利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论。

3、邓正来： West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he case of legal science (1978-2008)



作者： 邓正来

论文： West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he case of legal science
(1978-2008)

发表于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0)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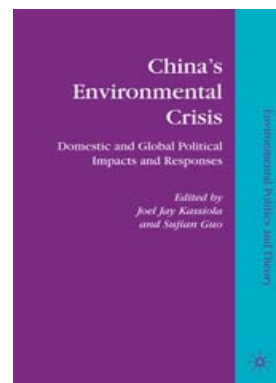
4、郭苏建教授主编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Domestic and Global Political Impacts and Responses出版

Edited by Joel Jay Kassiola and Sujian Guo

Palgrave Macmillan, 11/9/2010

ISBN: 978-0-230-10664-2, ISBN10: 0-230-10664-1,
5 1/2 x 8 1/4 inches, 240 pages, 1 pg fig,



This wide-ranging and path-breaking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takes a new approach, transcending the typical "gloom and doom" media and scholarly report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to address how the 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were impacted and how they responded, or should respond, to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hina. Therefore, this collection provides innovative analyses about the impacts and responses—both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of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encompassing its social values, ameliorative, and preventative policies. It leaves us with such an important question to ponder: What social action will be needed in the near- and long-term future in order to avoi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as well as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for the long term in China?

Praise

“The authors cover a wide span of issues rang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ecological conditions (such as desertification, biodiversity, and food security, all closely interlink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o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GOs and social chang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governance. Going beyond a pure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book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 their possible reasons and ways out and shows the interdependencies of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ir repercussions on the Chinese society. Economic welfare--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like--provides for an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which, for example, is reflected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NGOs with growing influence dealing with issues such as local pollution, safety standards, biodiversity, desertification, and other issues. Broad environmental goals such as a green Chines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r the Chinese equivalent: a harmonious society) are getting higher on the political agenda on the central level and even locally. On the side, China on 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 level is willing to take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Confucian values or a Chinese way might be the only way out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local, regional, and even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which also can be understoo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book many deep thoughts on many urgent questions can be found. Containing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China’s most challeng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book is a must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ts.”--Andreas Oberheitmann, International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Tsinghua University

Biography

By Joel Jay Kassiola and Sujian Guo

Joel Jay Kassiola is Dean of the College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M.A. and Ph.D. degrees from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gra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program after several publications in various political theory themes turned to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political theory and modernity about 30

years ago. He published one of the first books in the emerging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in 1990: *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more recently, edited *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2003).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His most recent research has turned to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and development pertaining to green political theory,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His article titled "The Dilemma of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China's Path in the 21st Century" is published in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2007).

Sujian Guo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U.S.-China Policy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He holds concurrent appointments as Associate Dean and Distinguished Guest Professor of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at Fudan University. He is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eries Editor of Rowman & Littlefield-Lexington's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He received his MA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 academic articles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is authored and edited books include *Greater China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2009);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ese New Foreign Policy* (2008); *China in Search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2008);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2007); *New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2007);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0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n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2006); *China's 'Peaceful Rise' in the 21st Centur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2006); and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 (2000).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 Global Crisi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Confucius to Cell Phones--Joel Jay Kassiola and Sujian Guo *

Part 1: Current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ina: Desertification, Biodiversity,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Problems with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Hong Jiang * Network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in China--Sara R. Jordan * Changing Climate?
China's New Interest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Wei Liang *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Jerry McBeath and Jennifer
McBeath * Part 2: The Formation and Policy Influences of ENGOs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tics--Bjorn Alpermann * Responding to Climate Disaster: The
Cosmopolitan Challenge in China--Paul G. Harris * Part 3: Environmentally-Cause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Updated * Digital Powe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n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Yanmin Yu and Fanxu Zeng * Confucianizing Modernity and
“Modernizing” Confucianism: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Need for a Confucian
Positive Argument for Social Change--Joel Jay Kassiola

5、文森特·鲁吉罗 著 顾肃、董玉荣 译：

《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第八版）出版

文森特·鲁吉罗 著

顾肃、董玉荣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一版

目 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篇 背景

第一章 你是谁？



第二章 什么是批判性思考？

第三章 真理是什么？

第四章 认知意味着什么？

第五章 你的观点有多少根据？

第六章 证据是什么？

第二篇 易犯的错误

第八章 基本问题：“我的更好”

第九章 立场的错误

第十章 程序错误

第十一章 表达的错误

第十二章 反应的错误

第十三章 错误组合

第三篇 策略

第十四章 知道你自己

第十五章 敏锐地观察

第十六章 选择一个议题

第十七章 进行探究

第十八章 形成判断

第十九章 说服他人

注释

6、顾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基础评析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一辑/2010 年第一卷，2010 年 3 月；

【摘要】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单一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支持的，其思想基础可分为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激进的左派理论和文化保守主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民族主义主要是自由民主派与激进左翼排外这两种倾向。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先以自由民主和开放意识为主，后恢复对于西方世界相当程度上的敌视意识，部分地重复了冷战式的东西方对抗思维。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敌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情甚至无条件地歌颂俄罗斯的体制和对外政策、否定普世价值和民粹主义等内容。同时，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提出以武力保卫经济成果，持剑经商，领导和管理世界、甚至不惜一战的观点。对此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批评，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合理地处理东西方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

【关键词】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极左理论；自由民主；理性爱国主义

7、纳日碧力戈：民族三元观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摘要】 运用皮尔斯"大三元"和"小三元"的符号学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的民族现象,提出民族三元观在本质上是民族指号生态观,是维系现实生活与思想结构的共生丛。

【关键词】 民族研究；皮尔斯；指号三元

8、纳日碧力戈：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一个超级共同体的建设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88-94 页

【摘要】本文从多学科角度力图证明，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需要有多族协商的实践理性支持；以主权-空间共性统辖文化-情感特性是建设现代中国超级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中国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人们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和对民族多样性的深刻理解；族群和民族的多样化并不影响深层的政治认同，即多元和一体并不矛盾。

【关键词】中国各民族；共生；政治认同；超级共同体；生存性智慧；实践理性

9、纳日碧力戈：以言行事与符号“仿真”

《民族学刊》2010 第 1 卷第 1 期，12-18 页

【摘要】奥斯汀的施为句(performative)理论，突出说话即行事，有助于分析中国民族识别过程和改革开放前的民族情况；波德里亚的“仿真”理论强调符号强势，有助于分析当下中国民族与族群的研究现状。不过，对照中国民族现实，施为句理论不能涵盖民族过程的情感和符号层面，而“仿真”理论也忽视了符号主体的多样性，从而不能完全解决本土的复杂性问题。

【关键词】施为句 仿真 民族/族群 实践话语

10、纳日碧力戈：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人类学新篇

《世界民族》，2010 年第 4 期，38-41 页

【摘要】语言意识形态是让某种语言的结构和及其使用合理、合法的一系列语言信仰。语言接触不仅涉及语音、语法和词汇，还涉及语言意识形态。国民国家的构建既反映不同语言意识形态的矛盾、斗争或妥协，也反映不同人观和制度观。

11、林曦：历史远未终结 社会主义进行时——读《社会主义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春季卷 2010 年 3 月总第 30 期

【摘要】林春呼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传统,以探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道路。

【关键词】另类现代性; 社会主义

12、林曦: 英国《公司治理综合准则》述评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6 期

【摘要】英国的《公司治理综合准则》强调企业的自我管理。这部《准则》是在政府牵头、多方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是英国实业界和金融界朝自我管理方向迈进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英国严格的公司法传统和司法制度的一个有益补充。文中在对该《准则》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该《准则》应如何发展的看法。本文作者认为,该《准则》还必须在条款的制定中更多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而不仅仅是公司股东。这是该《准则》应该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这个《准则》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从中学习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

【关键词】《综合准则》; 董事义务; 自我管理; 利益相关者

13、吴冠军: 施米特的实证主义——考析《政治的概念》的方法论进路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第一辑/2010 年第一卷, 2010 年 3 月

【首段】在其名作《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Carl Schmitt)提出了其著名论断——政治即是划分敌友。施氏认为,敌友的对立存在是本质性的、基础性的与结构性的,“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施氏甚至将敌友划分称作为是一种“终极划分”(ultimate distinction),即“一切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活动均可诉诸这种划分”。因而,由“始终存在的划分敌友的可能性”所促生的“政治统一体乃是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统一体,与其他各种组织

相比，它具有决定性”。敌友划分不可超越且不容否认，“政治的极致也就是那些明确无误地把敌人确认为敌人的时刻”，“如果这种划分消失了，那么政治生活也将随之彻底消失”。因此，敌友这种最重要的界线划分就必须“以一个战斗性概念的面目出现的”全权国家（total state）予以维持。为了要反对“中立化和非政治化”，这种全权国家必须使国家与社会合一，并“潜在地囊括了所有领域”。按照施米特的看法，只有全权国家才真正构成政治（敌友划分）的单位，“在作为一个有机的政治统一体的国家之内，完全由自己决定敌-友的划分”。“一旦它不再拥有作出这种划分的能力或意志，它将在政治上不复存在”。而“如果这种统一体消失了，哪怕是潜在地消失了，政治本身就将不复存在”。⁷

14、陈润华：顺与逆、古与今：清理地基（一）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夏季卷 2010 年 6 月总第 31 期

【首段】政治哲学-神学的核心是天人（神人）关系。在若干的文明体系里，也即在各种特定的政治社会中，并非只有古代中国的先贤大哲考虑过天人（神人）关系和王制类型的问题。然像古代中国《易经》里所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即“人生天地之中”的天地人三道，可谓中国政治哲学-政治神学的根本点。而其间最重要的端点和引线，就是古今问题。它是老子《道德经》“以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孔子“三代有所损益”及“存亡续绝”的问题；也是理解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死；未来世代的当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过去世代的当下）之要害所在。只有深刻理解“当下”的世代，才能了解过去的当下、未来的当下；反之亦然。否则，就只剩下虚无的“当下”。

15、孙国东：同意：从契约论到商谈论

——简析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的合法化论说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一辑/2010 年第一卷，2010 年 3 月

⁷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载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 160-167、页 178-186、页 200。

【摘要】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同意模式”合法化论说的一种商谈论重构。抛开其他方面不论，哈氏的合法化论说至少要同时面临着如下两大挑战：既要在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现代复杂社会的条件下捍卫卢梭式“个人只不过是服从其本人”的“激进民主”传统，又要在保持实在法“不可工具化”（即“不可随意支配性”）的前提下捍卫康德式基于实践理性（合道德性）的合法化模式。按照我的理解，为了分别回应这两个挑战，哈贝马斯本人主要做了两项颇为复杂的理论建构工作——我分别将其称之为：“民主合法化的商谈论”和“实践理性的多态论”。

【关键词】合法化；契约论；商谈论；实践理性

16、孙国东：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

【摘要】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化理论是通过“重构性进路”而间接捍卫合法化的规范性传统。康德“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论说将合法性建立在“同意”之上，但同卢梭不同的是：它通过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来确保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可能性。尽管康德主张“法律”（正当、正义或权利）优先于“伦理”（德性），但这两者均从属于其实践理性法则。哈贝马斯通过“实践理性多态论”的建构及其在法律领域的运用，消解了康德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设定的等级结构。

【关键词】重构性进路；公意；实践理性；合道德性；商谈

17、沈映涵：建构“中国式”政治合法性

《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国内信息版

【首段】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面对全球化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中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和现实解释力以适用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由复旦大学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政治学会（美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季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杂志社协办举行了第二届“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年会”之“合法性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的 60 余位知名学者就合法性与治理的相关理论问题、中国的治理理论和实践及其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二、学术讲座

1、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五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

2010 年 6 月 24 日中午 11:5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五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著名法学家、浙江大学法学院孙笑侠教授担任主讲嘉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公丕祥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范进学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黄锬博士等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本次学术午餐会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郭苏建、林曦、刘清平、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向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嘉宾们简要介绍了高研院概况和各位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接着，向大家介绍了孙笑侠教授的基本研究经历和学术成果。

特邀嘉宾孙笑侠教授感谢了高研院的这次邀请，表示非常高兴来到高研院和大家做交流，并围绕“热点案件的司法与民意”这一主题展开发言：

首先，孙笑侠教授指出，在我们的现实法律生活中，无论大案和小案、重案和轻案、命案和要案，形形色色的案件都可归入以下两类案件：一类是除当事人以及办案的司法官律师之外几乎无人问津的案件。这类案件对于广大民众而言，

只不过是法院档案架上的一叠案件卷宗而已。另一类则是引起全社会关注和热议的焦点案件或热点案件，这类案件从无人知晓的个案，演变成为家喻户晓、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原本是一个小范围的地方性私人间的诉讼小案，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成为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

其次，孙笑侠教授将这些热点案件依据公共性的主题分为官民冲突、权贵身份、社会民生、道德底线、公德困境等五类。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关切的兴奋点所在，可以通过个案来分析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再次，孙笑侠教授提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民意”，既要充分肯定“民意”推动中国法治的积极作用，也应当看到“民意”对司法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民意”本身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是在内容上往往产生于朴素的义愤；第二，“民意”具有不独立性，易受外界诸因素诱导而发生变化。“民意”也具有一定的盲从性；第三，“民意”存在着“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第四，“民意”的碎片化（fragmental）；第五，当下“民意”的背景从过去统一的正统价值观，发展为世界观、人生观和是非观的分裂化；第六，“民意”的“娱乐化”，通过网络发帖子的方式，呐喊泄压、嘲讽挖苦、游戏娱乐，甚至从众起哄的心理。



最后，孙笑侠教授强调当今中国由于司法制度及司法文化的欠缺，司法与“民意”的冲突愈演愈烈。解决司法与“民意”的不协调关系，需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完成职业化的过程 and 任务，同时根据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来建立中国的吸收“民意”的机制，诸如陪审团制、藐视法庭罪等制度。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以美国司法惯例为例），其方法主要包括：有目标地控制陪审团、发布言论限制令、隔离陪审团、移送管辖、延期诉讼、不公开审理，甚至对已作的判决予以撤销。我国司法机关在面对“民意”和舆论时总是以“司法独立”或“独立行使审判权”为由来拒绝言论自由（媒体或公民），这样的理由是否正当？其实在“民意”与司法的关系中，被告的公平受审权应当受重视而非不重视。



在接下来的学术讨论阶段，张乃根教授指出，对社会科学在审判中的应用这种方式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法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从80年代到现在，法理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对热点案件或者说公众关注的案件等这些棘手案件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困境。大体上说，中国这些案件大多与民生有关，而西方的则更多地与宪政有关。张乃根教授继续追问：作为公意的法在中国有何特殊含义？我们立法的本质到底体现了什么？中国的法到底反映了什么意识？只有民主的精神下才有法吗？

范进学教授强调，关于法与“民意”的关系，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是否顺从“民意”，或者是反映“民意”。“民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公意；一种则是众意，反映私人的、小团体的意志，它又可以分为即时型众意以和积淀型众意，后者正是法官在审判中所应体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司法中立（不同于“司法独立”）的问题，司法应中立于当事人之间，中立于政府机关和立法机关，中立于众意。法律不能完全顺从民意，尤其是不能屈服于即时型民意。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司法传统到底是什么？



公丕祥教授指出，司法和民意的关系受到了大众极大的关注，这里面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在司法生活中，民意的表达是必然的趋势，在转型社会中则更为突出。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案件中，司法判决是和民意相吻合的。民意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的主流倾向，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意有一定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所以必须要理性地审慎地分析民意，防止非理性的民意影响司法公正。民意与司法互动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和司法的互动问题，必须还要深入研究，这在学术上是十分有价值的。

黄锬博士指出民意和司法还是应该适度分开,原因在于民意所具有的如下三个特点导致它不宜引入到法律当中。第一个就是民意的难以统计性。如果司法把所谓的民意引入到司法当中来,实际上可能仅仅只是符合了少数人的意见。第二个特点就是民意的易变性。司法在吸收哪一部分民意的问题上会很困难。第三个就是民意存在的廉价性以及容易受到操纵性。在当今中国,所谓的民意最常见的就是在网络上形成的,而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是极其廉价和方便的,而且又很容易受到操纵或诱导。



邓正来教授指出,民意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与司法的互动问题,还是一个在转型时期,中国人表达什么是一个好社会的看法的问题,而不是对某一单一事件的好坏判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恰恰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该问题对社会的重要性,而且卢梭的公意不能引入到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法律在转型社会背景下是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的。热点案件实际上反映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老百姓对既有权力结构以及改革成果等方面的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善待民意的要求尤为重要。此外,邓正来教授还指出,美国的司法体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中国社会来,我们亟需完成的恰恰是对焦点案件背后的东西进行探究,进而为中国司法建设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接着,与会学者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中美法律文化差别、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司法合法性以及民意的表达机制等各个角度谈了自己的想法,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有:法律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如何看待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如何形成理性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是否有尚法精神?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模式?针对司法领域,确定性的因果律背后还有什么?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发生冲突后怎么办?中国特色的司法干预机制的发展方向怎样?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对诸位嘉宾来到高研院与研究人员进行座谈交流表示了感谢,并对前述诸位学者的讨论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他着重指出,中国司法问题居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结构当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来看待某些有可能是假定性的判断,而是要尊重问题本身的繁复性,进而才能更为深入和切实地发现并研究好中国的司法问题。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的学术交流活动。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两到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其他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学术对话，促进复旦大学跨学科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2、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三十三）

陈弘毅教授主讲“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人权保障和民主发展”

2010年7月2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三十三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法学教授陈弘毅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郁建兴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吴冠军、林曦、沈映涵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他欢迎了陈弘毅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简要介绍了陈弘毅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顾肃教授与郁建兴教授。

在正式演讲开始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向陈弘毅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的聘书。接着，陈弘毅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人权保障和民主发展”的讲演。



首先，陈弘毅教授特别指出，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时候，主要侧重的是经济制度；但是，伴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制度同香港的差距在逐渐变小。此时，“一国两制”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意义要比经济方面的意义要大的多。正是在这种“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香港发展出了有别于内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而陈教授的演讲主要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述香港人权保障的情况和民主政治实践的变迁与发展。

然后，陈弘毅教授分析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正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特殊历史使得香港发展出了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政治、法律和人权保障制度。在香港，英国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权力集中在英国派来的总督手里。但是，英国还是将其普通法传统（如司法独立、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制度）移植到了香港。因而，香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继了英国式的法制。



接着，陈教授介绍了二战后英国政府在香港采取的政治政策。他指出，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香港左派人士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的政治运动的爆发，推动英国政府将“非殖民地化”进程推进到了香港；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提出劳动法、进行教育改革、公务员系统改革等，以改善市民与殖民政府的关系等等。

进一步地，陈弘毅教授重点介绍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民主的具体发展进程。具体而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奠定了香港民主回归的基调。1985年香港立法局的第一次选举是香港民主化的一个开端。1988年的第二次立法局选举中关于是否引进普选和直选制度的辩论则推进了1991年普选的进行。1991年，在香港出现“信心危机”的情势下，普选得以推行，民主派取得了多数席位，《香

港人权法案条例》的通过使法院开始有了违宪审查权。1992 年港督彭定康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试图推进香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但是中国中央政府并不认可其政改方案，1997 年香港回归后设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了 1995 年根据彭定康方案所确立的立法局。97 年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和香港各派政治势力在选举方案的改革上进行了一系列博弈；最终，在温和民主派的沟通与努力之下，2010 年 6 月 25 日，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接受了由温和民主派提出的新政改方案，大大提高了民主化程度。

最后，陈弘毅教授介绍了香港的人权保障制度。他指出，法制和人权保障制度是香港民主的基础与渊源。殖民地时代英国法制制度的影响、1991 年对美国式维权审查制度的引进以及香港政府对人权标准的自觉遵守和法院的严谨裁判使得回归后的香港在法制、人权、自由方面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处于领先水平。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非常赞同陈教授关于“一国两制对于香港的法制意义要比经济意义更大”的观点，并就陈教授的演讲谈了如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一国两制”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确是一个创举。我们是否可以从更全面的角度（如民族问题）来看它的启发意义？第二，中国大陆的法院是没有宪法解释权的，而香港法院则具备该解释权，可以根据具体案例的审判过程提出宪法解释。这在司法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方面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第三，按照现在香港的直选时间表，2017 年要实现双普选。假如说，普选中泛民主派同时得到了立法会的多数，选出了他们所推崇的特首，这对于香港的民主进程和我们自己的法治进程意味着什么？



评论嘉宾郁建兴教授认为，陈弘毅教授的演讲很有启发性，改变了他过去对于“一国两制并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成见与偏见。针对陈教授的演讲，他主要提出了三点问题。首先，政治专制主义加上经济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模式一度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但是，现而今为

什么会出现越来越盛的追求大众民主的趋势？其次，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中，应如何来处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香港民主派所追求的“民主”是不是“作为名词的民主”（而非“作为形容词的民主”）？如果是，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个“民主”？如果不是，我们又应该怎样在更高意义上对“民主”的意义进行补充？

陈弘毅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出了回应。他将香港的政治力量划分为了爱国爱党派（主要包括基层市民力量和工商界力量）和民主派（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他指出，虽然中央政府与温和的民主派有合作与妥协，但还是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基于此，他对香港的全面民主化的前景不是太乐观。针对郁建兴教授提出的民主追求问题，陈弘毅教授认为，民主派所追求的政治平等是18世纪以来由西方社会发展而来的民主，有着非常具体的内容，如普选权等。他认为这种追求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很自然的追求，与西方追求民主的过程有着类似的逻辑，即首先追求公民权利，然后再进一步追求政治权利。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观众席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陈教授在分析的过程中有没有对“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心态进行反思？面对香港基本法行政主导的模式越来越弱的转变趋势，香港立法会和全国人大应该怎样来解释和解决这种冲突关系？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中，香港的媒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将来由普选产生的香港立法会和全国人大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作为一个主权体的中国和“准主权体”的香港之间的关系？等等。



陈弘毅教授对观众的提问一一做出了回应。他不赞同用“后殖民主义”来解释一些香港人希望保留殖民地时代法制、人权、自由等元素的心态。他认为，法制、人权和自由作为普世性价值，不必然与殖民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有关联。陈教授指出，行政主导的模式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普选和政党政治则是基本法所允许发展的内容，二者的并存、碰撞与结合就造就了一个不协调的现象。香港媒体是非常自由的，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媒体也是市场导向的，对于能否将爱国爱党力量相对于民主派力量比较小的原因归咎于媒体的影响，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自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

西方式的理解，认为民主自治应当如西方的联邦制国家一样，香港人可以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在不越权的范围内，中央政府不应干涉。另一种则是一中国式的理解，认为高度自治不代表中央政府不可以采取一定的干预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对于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陈弘毅教授的演讲做出了简短而耐人寻味的总结性点评。他认为，陈教授的题目是一个非常考验智慧的题目。这不仅仅是“想世界”的人要去想的，更是“做世界”的人要去实践的。中国政府在大陆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在香港严格遵守自己的承诺、推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如果不是为了香港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福祉，又是为了什么？要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智慧，只停留在对文字内容和制度安排的表面理解上是远远不够的。

讲座开始之前，邓正来教授在其办公室会见了陈弘毅教授，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三、学术会议

1、“合法性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0年7月3-4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主办，中国政治学会（美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季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杂志社协办的第二届“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年会”之“合法性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行。



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Europea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University of Denver、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Fayetteville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Utah、University of Regina、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winburn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Leiden、University of Nottingham、Bosto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Notre Dame、Tuebinge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Houston、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Old Dominio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nnessee、University of Macau、Middlebury College、University of Lodz、Copenhagen University、Bucknell University、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College of Europe 和复旦大学等多家学术机构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林曦、刘清平、顾肃、孙国东、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沈映涵、邓正来等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中国著名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大会基调发言，他感谢了复旦高研院的盛情邀请，围绕“善治与合法性”这一主题，提出“善治是 21 世纪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命题。他强调：

第一，在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正在从福利、民主、善政转向善治，后者将会是“人类在 21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究其原因，俞可平教授分析到：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比哈贝马斯提出“合法性危机”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更加严重，而不断地产生合法性危机和不断地解决合法性危机正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合法性危机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动力，其产生和解决是人类政治进步的表现。近代以来，福利、善政和仁政逐渐成为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民主和法治几乎直接意味着政治合法性。21 世纪以来，人类在合法性问题上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输出自由民主的运动中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东欧地区，抑或是亚非拉等地，成功的案例很少，失败的案例很多。尤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种西式民主对于利益双方都是灾难性的结果。另一方面，非西方式的民主在一些国家的成功，正在动摇传统的民主理论，特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在政治上的稳定，正在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怀疑并反思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究竟是什么，代议民主是不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等问题。



第二，俞可平教授认为善治主要包含以下八个要素：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严谨。从政治学角度上讲，治理是公共权威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活动的过程，而治理中的善治则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合作的公共管理。

第三，俞可平教授重点剖析了善治作为 21 世纪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五点原因：善治包含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good government）、仁政等，但又超越了传统政治；善治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但又超越了民主的范畴；善治是服务于民生的必要条件，也是民生提高的必然结果；善治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提高，更意味着社会正义、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透明等方面的改善；善治具有超时空性，不同于许多其他政治概念充满了争议和分歧。

最后，俞可平教授指出，通向作为理想政治状态的善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前状态下，善政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也是走向善治的关键，因此民主和法治也依然是达到善治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来自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也做了题为“民主合法性的类型学分析”的基调发言。他主要讲了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朱云汉教授区分了传统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科学对民主合法性的不同进路，传统政治哲学重规范性研究，将民主合法性视为民主政府在道德上的证成，而政治科学的进路则是将民主合法性视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来加以研究，重视社会心理、因果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在这一经验性研究的进路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民意（或称之为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的研究，通过问卷、访谈和调查等形式搜集当下的公众舆论和观点，以此作为衡量政府是否达致“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一个标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舆论调查网络”的指标（barometer），对不同国家的民主程度进行测评。当然，朱云汉承认，要对民主合法性进行测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相当多的理论和比较研究都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许多调查而言，一个经常向公众提出的标准问题是，“比起其他形式的政府，您是否更偏好于民主？”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就是在民主运动高涨的地区，如韩国，人们的偏好于民主的程度，反而远远比不上政治形势更稳定的地区，比如日本。这实际上促使研究者去弥补目前广泛存在的民主调查方式中的缺陷。一个方法就是扩大民主合法性的内涵，增加“公众态度”这一维度，另一个方法就是将上述这种单项的测量标准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可以测量，公众是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的威权主义政府形式（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s）保持距离。当然，这两套弥补方案都远非尽善尽美，实际上，研究者要得出的结论，即“公众偏好民主”与“公众反对其他的威权主义政府形式”，此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为了避免这种“非此即彼”、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强迫受访者“立场”和“表态”的调查方法，朱云汉提到了一种替代的调查方法，那就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避免使用“民主”这样的字眼（the ‘D’ Word），而是转而关注民主的极大核心价值，诸如政治平等、公众问责制、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多元主义以及分权制衡。

这样的调查方法，就可以使研究者能够很好地将公众的“民主取向”（democratic orientation）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学上的维度：批评性、一致性、非民

主和表面性的民主拥护者。在这样一个调查方法当中，研究者将使用到相当多的定量和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回归分析、换算系数、缺省值计算等等。总而言之，朱云汉的基调发言为我们“衡量”民主合法性提供了一种严谨的“政治科学”进路。

本次会议共有七场专题讨论，分别是：合法性：中西比较；合法性：不同研究路径；合法性与治理的关系；合法性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政权合法性与大众支持；中国的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每场专题讨论均分为主题发言和问答讨论两个环节。



专题讨论结束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其一，从背景上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合法性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前，现代性的合法性的确立主要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个结构安排为基本背景的，涉及当时欧洲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的基本形势，以民族国家的主权为严格依凭，现代性合法性问题基本上是在一国内完成。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产生了许多任何单一政权无法靠自己力量解决的问题，例如全球整体安全问题、绿色革命问题以及公民社会问题。

其二，站在国别以及学术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合法性问题的世界主义时刻已然到来。前面的叙述告诉我们，现时代要求不同性质的政权共同体来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问题，也即对解决全球问题的诉求已经进入到了合法性之内。更明确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正在转型，交流日益密切，合法性问题因此成为跨国问题。一方面，一国政权必须认真面对“如何在国内有序治理”和“如何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这两个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学者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即必须回答下述问题：“全球性问题如何进入到我们对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内在纬度”；“既然法治、民主等概念严格以主权国家为边界，那么我们怎么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

其三，针对中国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权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而是在世界结构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使得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到他国的评价。因为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转型

期呈现出复合性和共时性这两个特性，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将会面对“如何更贴近中国实际的进行合法性问题研究”、“地方多元的合法性与中央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合法性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而坚持历史和当下的本土视角，破除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研究，找到与当下中国人的生命更为紧密的关联。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代表会议主办方向诸位嘉宾和到场旁听的学者和学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宣布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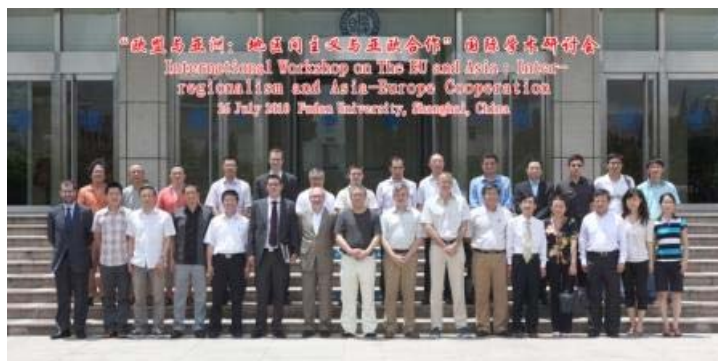
据悉，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诸位学者的论文近期将结集出版。

附会议议程：<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436>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2、“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与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0年7月26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亚欧基金会、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清华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与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参会嘉宾分别来自如下机构：亚欧基金会、比利时大使馆、联合国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欧盟委员会驻韩国使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王志伟律师事务所和复旦大学等等。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林曦、刘清平、顾肃、孙国东、吴冠军、陈润华、邓正来等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教授、清华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所长宋新宁教授主持，他简要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背景，并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了基调发言，他代表复旦高研院欢迎诸位嘉宾来到复旦大学参加本次“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与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向诸合作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邓正来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讲述了本次研讨会的背景：第一，全球化正在引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主要是针对和超越现代性的世界，但它绝不是后现代的世界，因为后现代的世界至多是现代的一个娱乐化的翻版，一个反讽的部分而已。不过，这个新时代迄今为止还没有定型，它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因为它还只是一个没有自己世界观的世界。正因为此，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个新世界的世界观进行探究，相信本次会议的讨论一定会给予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



第二，这个针对并超越现代性的世界，至少有两种正在起作用的政治理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欧盟的欧洲理念，一个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世界政治理念，也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天下理念、大同理念、新战国时代理念、主体性理念等等。这些绝不是美国这个新帝国所提供的世界政治理念，因为美国所提供的理念，仍然属于民族国家框架下带有封闭性的理念。欧盟的欧洲理念正在逐渐形成，它至少在部分上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大区域的共同体，它承继了古希腊德性公共性的精神传统，秉承了康德关于政治联盟的世界和平理论。众所周知，在欧盟共同体下已经逐渐形成社会市场和生活质量等新的理念。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理念，则完全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以外进行思考的世界政治理念。本次会

议把欧亚这两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把非现代性政治理念的地区放到一起进行讨论，可见这次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洞见力。相信“欧亚”这个概念会在今后我们关于新世界的讨论中起到更重大的作用。

第三，无论是欧盟与亚洲合作，还是地区间主义的问题，在本质上都预设了对十六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框架下的各种国家制度、国际制度的质疑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下述问题：我们究竟如何认识和反思现代性的各种制度？我们究竟如何建构新时代地区间主义的各种制度安排？我们究竟如何认识和协调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益诉求？我们究竟如何协调并建构不同地区关于新世界的政治理念？等等。



来自比利时领事馆的 Jan Vendeput 领事指出，邓正来教授的发言为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继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对现代性的反思和亚欧共同点的关注等等。Jan Vendeput 领事同样向各位到场嘉宾表示了谢意，并预祝本次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本次会议共有两场专题讨论，上午进行的第一场讨论主题为“EU and Asia: Inter-regionalism and EU-Asia Cooperation”，一共有五位发言嘉宾，他们分别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古斯塔夫·杰拉尔茨教授，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Sven Biscop 教授，欧盟委员会驻韩国使团白小川教授，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发言嘉宾围绕亚欧概念、国际关系理论、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问题做了精彩阐述。到场的二十余位嘉宾提出了许多开放性的问题，大家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出发，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学术探讨。

下午进行的第二场讨论由邓正来教授担任主持人。亚欧基金会执行主任多米尼克·吉拉德大使（Ambassador Dominique Girard）代表主办方之一亚欧基金会致辞。他指出，亚欧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帮助不同领域的学者针对大家都关心的涉及亚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研



究和对话。基金会力图为国际组织和学者的交流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鼓励来自不同视角间的对话和碰撞，希望学者们能够对国家、社会和超国家组织的发展进行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可行性建议。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副理事长卢克·范·兰根霍夫教授做了题为“地区间主义的兴起和世界秩序的未来”的主题演讲。他回顾了地区秩序的创造形成史、操作机制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启示。



第一，兰根霍夫教授承认，从现代性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国家是欧洲的一项发明，历史上它被出口至世界的其他地方，现已成为全球各国的一个重要的模仿对象。

第二，兰根霍夫教授认为地区间主义有利于解决一些超出主权民族国家能力范围的问题，如边境安全、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

第三，他进一步将地区间主义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其一，主要关注的是地区贸易协定，该阶段把经济合作作为推动区域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其二，关注的重点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通过政治途径和国家级以上和以下机构的积极参与来达成。其三，也即现阶段的地区主义的焦点是超出主权之外的问题，比如成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现阶段的地区主义对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世界秩序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兰根霍夫教授指出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区域化将有可能促成“多边主义 2.0”这一新的阶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认识到目前欧洲和亚洲在区域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而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妥善化解这些挑战我们才有可能迎来“多边主义 2.0”。

宋新宁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兰根霍夫教授的演讲凸显了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也就是政治的全球化。但他对兰根霍夫教授使用地区间主义的概念来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所有挑战的乐观想法持怀疑态度。这种地区间主义会比至今仍长期存在的国家间的合作更加有效吗？而且，发



展具有多种层次，以此看来，将地区间主义分成不同阶段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比如，许多地区目前还远远未达到欧盟国家间的合作水平。因此，这种“地区间主义代别”的概念可能还不如“地区主义阶段”更为有效。



古斯塔夫·杰拉尔茨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卢克·范兰根霍夫教授或许低估了不同地区之间竞争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并不存在地区间主义的孤立模式，各个不同地区均处在密切联系的相互竞争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型构未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着着眼点放在各个地区，而且更要关注核心区域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杰拉尔茨教授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多极化将成为指称多元领导力量崛起的更为有效的概念。

接着，到场的各位学者针对卢克·范兰根霍夫教授详细论述的地区间主义与亚欧合作提出了许多学术问题，现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代表会议主办方向诸位嘉宾和到场旁听的学者和学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宣布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附会议议程：<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542>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舒彩霞/文）

3、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第二期）”举行



2010年7月5日到7月16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第二期）”（以下称“讲习班”）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讲习班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文科科研处和外事处审批，共邀请海内外十一位著名学者担任主讲教授，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从全国各地各个不同专业招收了二十多名博士或高校青年教师作为学员，历时两周，于7月16日正式结业。讲习班旨在提高青年学者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动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能力，拓展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强化中国化的问题意识，推动青年学者从事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研究。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出席本次讲习班的开班仪式，他简要讲解了此次讲习班举办的目的和意义，勉励广大学员珍惜高研院提供的这次宝贵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踏实学业，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Daniel A. Bell、Edward Friedman、朱云汉、Jack Donnelly、Peter Moody、王国斌、Philippe Schmitter、Joseph Fewsmith、林尚立、张旭东、邓正来等十一位著名学者担任此次讲习班的主讲教授。诸位教授的研究横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学员提供了多元化的跨学科的教育和指导，培养他们从事理论研究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使得学员们既具有中国关怀又不乏世界视野。

二十多位青年学术人才作为学员参加了此次讲习班，他们的选拔是基于学术规范和学术平等的原则，由高研院组织专门的学术委员会从众多报名者中按照纯粹的学术标准经过匿名评审择优录取的。学员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



传播学、文学、行政管理学等；来自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如中南大学、香港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纽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央党校、同济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加州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北

京语言大学、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等。讲习班旨在促进这些具有不学员术背景的学员们之间的交流，相互激发对问题的感知能力，营造出勤勉刻苦、共同进步的良性学术氛围。

此次跨学科讲习班一共有十一场，每场分为上下午两个环节，上午是三个小时的学术演讲，由主讲教授针对问题讲解各自研究的规范、理论、学派、范式和方法，下午是两个半小时的主题研讨，通过师生之间不断地提问和回答这一讨论的方式将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明晰和深化。本次讲习班围绕“政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基本情况如下：



2010年7月5日，清华大学哲学系、美国政治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作了题为“论基于城市的身份认同的伦理意义与政治意义”（On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ity-Based Identities）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6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Edward Friedman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China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7日，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Chu Yun-Han）教授作了题为“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学术讲座。



2010年7月8日，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Jack Donnelly教授作了题为“New Directions in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9日，美国圣母大学穆磐石（Peter Moody）教授作了题为“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11日，复旦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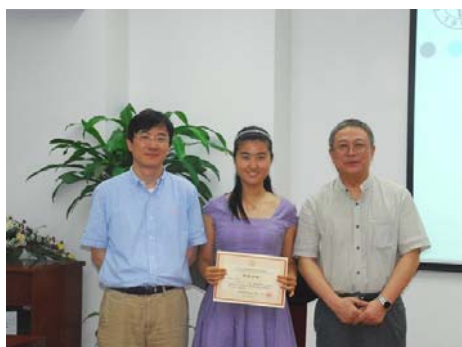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王国斌（Roy Bin Wong）教授作了题为“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Challenges to and Lesson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的学术讲座。



2010年7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作了题为“政治科学的微观基础”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13日，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作了题为“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Governance”的学术讲座。



2010年7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作了题为“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15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做了题为“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空间”的学术讲座。2010年7月16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张旭东作了题为“Legitimation Crisis” Revisited: Knowledge, Interest, and the Political 的学术讲座。



最后，在讲习班结束之际，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参加本次讲习班的每一位学员颁发了精致的结业证书，学员们表示要好好保管这份证书以作为参加此次讲习班的一个标志和自己心路历程的一份回忆，并期待下一次讲习班早日举办。此外，为了进一步推进

第一期学员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老师和学员们在网络上建立了讲习班的学术群,并推选专人负责,以便集中管理,促进学员们认真阅读,加速彼此间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本次讲习班引发的学术讨论都非常激烈,一些来自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同学和老师全程旁听,同时,还有一些上期讲习班的学员继续来听课,大家都表示十分期待下次讲习班的到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4、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二届)举行



2010年8月9日至27日,由复旦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联合举办的第二届“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本届翻译班为期19天,共招收中译英小组外方学员7人、英译中小组中方学员12人。



本届翻译班在招生程序、课程安排、授课方式等方面都延续了上届传统。中译英和英译中小组的主讲教师分别由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系胡志德教授和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担任。学员名单亦依原定程序严格筛选产生，主要来自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博士研究生、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



本届中译英小组的文本由学员依兴趣自行选定。课堂上，胡志德教授结合文本不时引经据典、插科打诨，课堂气氛活泼愉快。针对翻译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如词汇的理解与选择，学员和教授间讨论热烈、深入。本届英译中小组则以 Alan Ryan 的“Liberalism”为翻译文本，邓正来教授指导学员对文本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严谨的翻译，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更重在培养学员严谨、务实的学术作风。两个小组上课时间交错，其中，中译英小组每周一、四上课，英译中小组每周二、三、五上课。中美方学员可互相旁听课程。由此，课堂讨论通常异常热烈，从主讲教授到学员，再到在场的中、美旁听生，大家各抒己见，不时激发出灵感的火花。

8月27日下午4点，第二届 Fudan-UCLA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毕业典礼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邓正来教授代表授课教师和主办方做了重要发言。首先，他对本届学员的翻译功底和学术热情给予了肯定。同时，他指出，作为一个译者应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以避免翻译中的理解偏差。为此，他建议学员拓宽知识面，提高原典阅读的数量和精度，切忌粗枝大叶。最后，邓教授根据每个学员的特点，



分别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寄语。结业仪式上，邓正来教授作为本届翻译班的主办方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师生拍照留念，本届暑期班圆满结束。

（石晓玲，王晨丽/文）

附：2010 年度“Fudan-UCLA 第二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学员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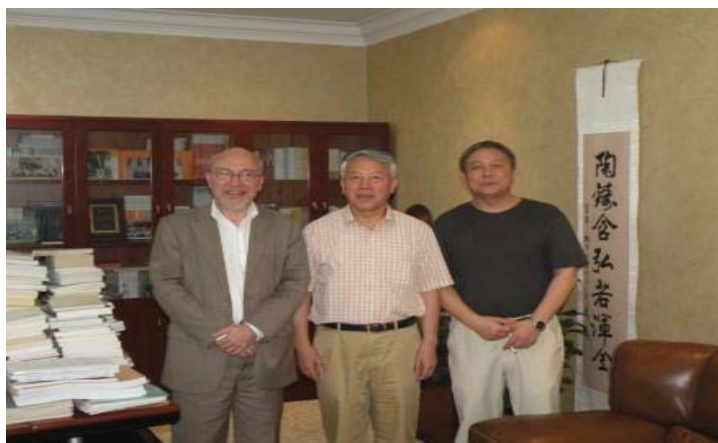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学习/工作单位
1	刘文楠	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2	郝诗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3	赵琪	同济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4	杨昕	安徽中澳学院讲师，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员，上海理工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
5	黄珍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6	王平先	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
7	聂家昕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8	顾瑶	复旦大学文科学报编辑
9	贾钦涵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
10	江雨斯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09 级翻译硕士研究生
11	马华灵	华东师范大学西方思想史硕士研究生
12	李子谦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四、学术合作

1、秦绍德书记会见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副主席兰根霍夫教授

高研院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就筹备 2012 世界社会科学论坛草签协议



2010年7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The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以下简称“高研院”）会见了正在复旦大学访问的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以下简称“ISSC”）副主席卢克·范·兰根霍夫（Luk Van Langenhove）教授。秦书记代表复旦大学感谢 ISSC 将 2012 年“世界社会科学论坛”（World Social Science Forum, WSSF）的主办权交给复旦大学，并就筹备工作中的各个注意事项和实施方向等与兰根霍夫教授交换了意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外事处副处长朱畴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教授、清华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所长宋新宁教授，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等会见时在座。



当天下午，邓正来教授和兰根霍夫教授分别代表双方就举办 2012 年“世界社会科学论坛”草签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2012 年世界社会科学论坛由复旦大学等单位主办（高研院承办），相关实施细则将由双方进一步磋商。

在签约仪式上，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高研院向支持高研院承办 2012 世界社会科学论坛的各位执行委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特别对 ISSC 选择在复旦大学举办世界社会科学的盛会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并向大家简要汇报了本次论坛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ISSC 副主席卢克·范·兰根霍夫教授感谢高研院和复旦大学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希望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举行的世界社会科学论坛）的筹备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并最终获得圆满成功。



据悉，ISSC 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第 11 号决议》（1951）于 1952 年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学术组织，总部设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楼里。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该理事会旨在在全球范围内代表社会与行为科学，推动社会和行为科学的研究及运用，并保证它们在国际层面上的表达。为推动全球各地社会科学的发展，促进其相互合作，并提升它们的创新与运用，ISSC 于 2009 年创办了“世界社会科学论坛”。2009 年 5 月，ISSC 与挪威卑尔根大学联合主办了首届世界社会科学论坛，全球超过 400 名著名学者相聚挪威，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前沿问题。2009 年 11 月，经过 ISSC 的两轮讨论和投票（ISSC 执行委员会 10 人投票的结果为 9 票赞同、1 票弃权），复旦高研院以接近全票的支持全面胜出与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HSRC）的竞争，为复旦大学赢得三年一度的 2012 年“世界社会科学论坛”的主办权。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二届世界社会科学论坛的主题是：“一个星球，新的秩序？”（One Planet, New Orders?）。论坛将于 2012 年下半年在复旦大学举行，届时将有超过 1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学者、专家与会。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2、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以下简称“ORF”）于7月28日就双方建立长期的多方位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进行了热烈的商讨，并就两个学术机构的第一个研究合作项目《中印创新和企业精神与基层民主和治理的关系》达成合作协议。

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与印方 ORF 主席 Sunjoy Joshi 在上海古井假日酒店签署了 this 协议。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研究人员林曦博士等和印方 ORF 副主席 Samir Saran 及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签约仪式和印方随后为此举办的庆祝酒会。



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农村经济历来在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一直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面临来自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政治经济、资源、环境、技术、人口等诸多方面的严重束缚和挑战。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中印两国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比较研究，探索“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对两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重要作用，特别关注其与农村基层民主和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同时考虑地方性文化、人口和地缘等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层次影响。该研究项目将在中印两国挑选一些有区域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农村地区，就影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上述各类因素进行实地调研和案例比较，探究一般性经验和地方特殊性，从而提出对中印两国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和具有理论意义的一般性概括。

在双方举行了座谈会上，双方还具体讨论了高研院和 ORF 在其他领域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和设想，期待着今后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

附录：

印度媒体对此次中印研究机构联手合作的相关报道:

<http://www.newstrackindia.com/newsdetails/172030>

<http://www.newdelhinews.net/story/666782>

<http://www.daylife.com/article/0gfx6DbgfB3Uq>

<http://www.anhourago.in/show.aspx?l=5318549&d=502>

<http://www.newkerala.com/news2/fullnews-11554.html>

<http://news.oneindia.in/orffudan-university-to-study-rural-economies-and-governance.html>

3、复旦高研院与《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创办“西方大师看中国”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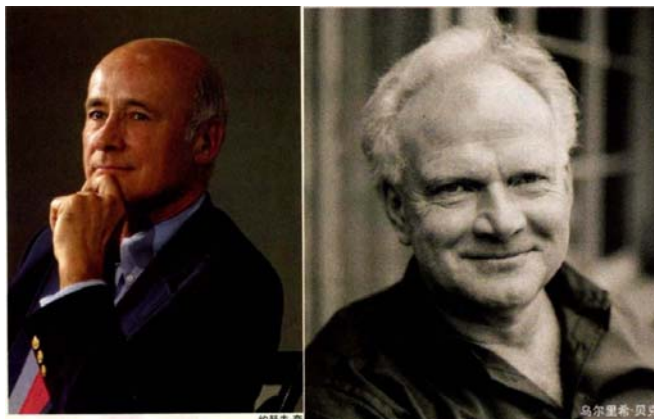


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两大盛事让中国进一步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之下。在更大的背景之下，目前余波仍然未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缺陷。

“与众不同”的中国，目前快速的发展能否持续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应该承担怎样更大的历史使命？在中国转型和世界变局的这个节点上，思考这些问题显得尤为有价值。为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创办“西方大师看中国”专栏，邀请一批国际著名人文学者，写下在这一时刻对于中国最敏锐的观察和最直率的建议。

目前，“西方大师看中国”专栏已在《瞭望东方周刊》出版五期，分别为约瑟夫·奈：《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崛起》，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0期；乌尔里希·贝克：《中国之于世界的使命为何》，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1期；马克·沃伦：《中国式“治理驱动型民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

第 33 期; 古德蒙·赫内斯:《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 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 年第 34 期; 迈克尔·斯彭斯:《从“汉学”到“中国研究”之变》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 年第 35 期。



五、学术出访

1、高研院一行出席“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7 月 30-31 日, 应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邀请,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顾肃教授、吴冠军博士、刘清平教授、孙国东博士、陈润华博士、邓正来教授以及高研院学术联络中心的沈映涵博士、陈晔老师、舒彩霞老师、张东平老师、王晨丽老师赴长春出席了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吉林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奥地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 70 余名学者出席, 与会学者们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与法治”、“国际法治的理论与实践”、“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问题”、“国际法治视野下的国际司法”等五个单元的主题研讨中分别就

如何深化全球治理的跨学科研究与合作、如何推进法律与全球化研究、如何处理当前世界秩序中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主题进行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分别在会上进行了正式发言。陈润华博士、林曦博士等参与了相关环节的学术讨论。



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邓正来教授应邀在闭幕式上为整个会议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总结。

在总结发言中，邓教授在对诸位与会代表及会议主办方表达了感谢以后，从学理上对大会的两个主题——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进行了点评并简要阐述了自己的相关思考：

首先，他从历史和当下两个向度对“国际法治”的相关背景进行了批判性检视。从历史上看，当前国际法律秩序实际上是原本解决欧洲问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产物。以“民族国家”和“主权体系”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世界范围的适用源于两大事件：一是经济的驱动导致殖民地的形成，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以后，欧洲中心主义的主权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强加给中国等亚洲国家，殖民地的解放导致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的确立，即形成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或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有其自身的世界观，其核心为主权自治。由于这种主权体系的形成并不是当然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接受为当然的具有合法性的体系。就当下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然受到挑战。冷战以后，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愈加凸显，比如环境、能源、战争等问题使得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其根本特点是：第一，民族国家与主权体系已不足以支撑这个新的时代，因为民族国家与主权体系只关注一个国家的问题，并且即使在关注某些国际问题时，其也是在

关注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开始超越只关注一个民族利益的模式，使得世界出现以前没有过的特点。第二，这个世界是“去主权”、“去国家”的时代，它不再仅依赖于主权国家，而是一个混合体，它决不再是“国际”的时代，而是“后威斯特法利亚”时代。因此，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讨论“国际法治”的时候，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充其量只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维度，并且即使我们在讨论这个维度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将我们的视野局限于威斯特法利亚时代。

其次，他简要地讨论了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他指出，在全球化这个新的时代，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或政策、讨论机制等层面的全球化，因此我们不能将全球治理问题视为当然，而应当注意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一个新的世界需要新的世界政治理念，这种新的世界政治理念才能决定整个世界将走向何方。我们目前主要拥有三种不同的理念：第一，美国新帝国主义不能成为新的世界政治理念，因为它仍建立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第二，欧盟提出的新的欧洲理念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它至少在形成一个区域共同体，至少是在试图解决民族国家框架和主权体系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三种理念来源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学者提出的诸如“天下”这样的理念，它有可能为新的世界政治理念提供思想资源。

最后，邓教授强调，当我们讨论“国际法治”、“全球治理”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究竟是在何种新的世界观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他指出，我们从诸位的论文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线索和可能性，希望在诸位学者的论著和今后的交流中看到更精彩的关于这方面的思考。

会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与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显教授专门就两个学术机构今后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磋商，双方确立了相互交流研究和合作研究等具体事项。会议期间及会后数天，双方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之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双方的知识团结和学术友谊。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沈映涵/文）

2、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

并担任中山大学“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研究生学术论坛授课老师



2010年8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在广州中山大学胜利召开。我院纳日碧力戈应邀参加会议并做发言。来自全国各地28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近50名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参加会议，隆重纪念我国承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召开一周年，并就“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广泛交流和深入研究。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十二五”期间加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建议书》。

中山大学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于2010年8月29日至9月3日举办主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的研究生学术论坛。本论坛采用暑期学校的方式开展，从全国43所高校公开录取近百名博士和硕士生作为学员，同时邀请在相关领域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担任暑期学校教师。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于8月31日和9月1日授课两次，题目分别为：“阿尔泰游牧走廊的文化勾连：当代中国共生观察”和“基于中国民族的西方族群理论——盖尔纳批判”。

六、学术信息

1、邓正来教授文章收录于《世界社会科学报告》（2010）

日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联合推出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WSSR）——知识鸿沟》（2010年）正式出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约撰写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西方化：以法学为个案的研究》（West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he case of legal science）被收录其中。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系全球范围内比较和分析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权威出版物，每十年编辑出版一次，一般由各国著名学者撰写不同章节，以检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发展状况。邓正来教授于 2009 年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签订了约稿合同，应约撰写对西方社会科学霸权进行反思的章节，经严格评审后，被录用出版。在邓教授撰写的该文中，他在简要梳理中国社会科学晚近 30 年来发展史的基础上，以中国法学为个案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倾向，并提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实现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进而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

据悉，《世界社会科学报告（WSSR）——知识鸿沟》（2010 年）系首次收录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报告，除了邓正来教授外，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黄平研究员撰写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韦莉莉撰写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与评价》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克斌撰写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收录其中。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在该书发布会上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完全由西方大学主导的局面正在为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打破，尽管北美和欧洲出版的社会科学专业期刊仍占全球总量的 75%，但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事实上，《世界社会科学报告》首次收录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它表明：中国学者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社会科学的学术对话，这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大有裨益。

2、我院纳日碧力戈教授获 2010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获 2010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其研究的题目是“根据中国民族经验的皮尔斯三元理论研究”。

纳日碧力戈，1957 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原美国明

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珍妮-拉菲尔·伯恩斯坦亚洲研究及人类学讲座教授。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语言人类学、族群与种族、少数民族教育、东亚研究。主要著作有：《姓名论》、《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China's Minorities on the Move (with Robyn Iredale et al.)等。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3、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结项答辩通知

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规定，本着学术平等和宁缺毋滥的原则，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经过申报、评审、立项、中期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现进入结项阶段。

该项目结业答辩时间定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上午 8:30-12:00，地点为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

本次结项答辩具体安排如下：

(1) 每个课题组出一名代表（原则上为项目负责人）来高研院进行结项答辩；

(2) 成果鉴定和结项材料递交请参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

(3) 本次结项答辩的交通和食宿费用从项目经费中支出；

请答辩项目组成员接到本通知后即刻与高研院取得联系，以确定参加及相关具体信息。

联系人：沈老师

信箱: ias_fudan@yahoo.cn

联系电话: 021-55665553

附: 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结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申请人及单位	课题名称	成员及单位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	董磊明(华中科技大学) 张善根(华东政法大学)
唐娟 (深圳大学)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研究: 对 30 年来基层选举制度 演进的经验观察与理论 思考	陈家喜(深圳大学) 邹树彬(深圳大学)
徐 昕 (西南政法大学)	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 1983-2008	田璐(西南政法大学) 曾令健(西南政法大学)
魏敦友 (广西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基层司法活动 中的检法关系研究》	周腾(广西百色市人民检察院) 马方(西南政法大学)
李德瑞 (华中科技大学)	乡村问题如何“惊扰” 了中国社会科学——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大 陆乡村研究与政治 学、法学、人类学、 社会学的关系分析	申端锋(华中科技大学)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
王庆明 (沈阳师范大学)	底层记忆与单位依赖 ——中国第一家破产国 企下岗工人的生命历程	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 王旭辉(北京大学)

	研究	
--	----	--

4、复旦高研院 2009 年度

“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结项答辩通知

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规定，本着学术平等和宁缺毋滥的原则，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经过申报、评审、立项、中期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现进入结项阶段。

该项目结业答辩时间定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下午 3:00-5:30，地点为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结项答辩具体安排如下：

(1) 每个课题组出一名代表（原则上为项目负责人）来高研院进行结项答辩；

(2) 成果鉴定和结项材料递交请参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

(3) 本次结项答辩的交通和食宿费用从项目经费中支出；

请答辩项目负责人接到本通知后即刻与高研院取得联系，以确定相关具体信息。

联系人：沈老师 ias_fudan@yahoo.cn； 021-55665553

附：2009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结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申请人	项目关键词	单位/身份
1	段 颖	离散族群	香港中文大学/助教

2	林 曦	情 理	复旦大学/讲师 伦敦政经学院/客座研究员
3	杨 昂	和 平	华中科技大学/讲师
4	周 赟	立 法	厦门大学/副教授

5、复旦高研院2010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入围初选名单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申报及初审工作日前结束。我们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英国肯特大学等三十余家海内外学术机构学者的申请。在此，我们对这些单位和课题组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次课题申报主题为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中国底层问题研究或基层制度研究和学术工作坊年度特别项目（2010）。经过初审专家的严格评审，确定以下 10 项课题进入下一轮评选序列：

附：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入围项目初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负责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合作者
杨 华	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王会（华中科技大学） 郭俊霞(华中科技大学)
韩秀义	中国宪法实施难题的理论应对——以“一体二元”宪政理论的构建与展开为核心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邱永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梁剑兵（辽宁师范大学）
张一平	新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治理研究(1949-1953)	上海财经大学	尚红娟（复旦大学） 侯艳兴（华东师范大学）

聂家昕	“生活世界中的乡村天主教徒：来自冀中大南赵村的考察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	周典恩（安徽大学社会学系） 董敬畏（浙江省委党校）
刘愿	失地农民贫困化原因研究——基于广州大学城征地案的权利视角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	张茂元（华南师范大学） 易远宏（华南师范大学）
郭亮	制度转型期的农村地权纠纷问题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
王修晓	市场转型与“单位”内部权威关系的变迁——一家国有企业的三十年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苗大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孙晓舒（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黄河	中国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学院	段亚男（宁波市政府） 邱幼云（杭州师范大学）
李艳霞	当代中国底层政治信任研究：当代中国底层政治信任研究：	厦门大学	薛洁（吉林大学） 唐美玲（厦门大学）
孙国东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基于浙江温州龙岗镇发展经验的解释性研究	复旦大学	林曦（复旦大学） 杨晓畅（吉林大学）

本着对每一个项目组和高研院设置该项目初衷负责的考虑，经过认真权衡，并参考相关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决定对复审入围的 10 项申请课题进行现场答辩，以确定最终的资助对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每个课题组派一名代表（原则上为项目负责人）来高研院进行项目答辩；

(2) 如果通过最终的评审, 则本次交通和食宿费用从项目经费中支出; 如未能获得经费资助, 本次交通和食宿费用由复旦高研院负责报销;

(3) 答辩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8:30-12:00, 地点为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9 月 18 日将举行 2009 年度“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一般性项目和关键词特别项目结项答辩, 9 月 19 日下午将举行 2010 年度“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的入围答辩, 欢迎诸位初选入围者前来旁听);

(4) 入围的项目组接到本通知后请与高研院取得联系确定相关具体事宜。

联系人: 沈老师

信箱: ias_fudan@yahoo.cn

电话: 021-55665553

6、复旦高研院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

关键词特别项目入围初选名单

复旦高研院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及初审工作日前结束。自该项目申报启事发布以来, 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延安大学、重庆三峡学院、德国弗莱堡大学等二十余家海内外学术机构学者的申请。

经过高研院学术委员会的严格筛选, 确定下列 8 项课题进入下一轮评选序列。

2010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入围初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申请关键词	单位/职称
1	褚宸舸	民 主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浙江大学博士生
2	彭 斌	共 和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
3	袁 剑	边疆	德国弗莱堡大学/博士生
4	伍 庆	认同	广州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5	姚传明	本土化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生
6	张纯厚	自 由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 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学 博士）
7	张 伟	人格	中山大学哲学系 /德国 Erfurt 大学天主教神学系博士 生
8	周云水	社会记忆	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

我们将组织复审答辩委员会对初审入围的这 8 项申请课题进行现场答辩, 以确定最终的资助对象。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1) 答辩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9 日(周日)下午 3: 00-6: 00, 地点为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9 月 18 日将举行 2009 年度“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一般性项目和关键词特别项目结项答辩, 9 月 19 日上午将举行 2010

年度“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一般性项目的入围答辩，欢迎诸位初选入围者前来旁听）。

（2）如果通过最终的评审，则本次交通费用（不含机票和软卧车票）和食宿费用从项目经费中支出；如未能获得经费资助，本次交通和食宿费用由复旦高研院负责报销；

（3）各项目组收到通知后请与高研院联系确认相关具体事宜。

联系人：沈老师

信箱：ias_fudan@yahoo.cn

电话：021-55665553

七、媒体报道

1、【瞭望】大学教授进中学：奉贤中学的通识教育实验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邓正来在奉贤中学“通识讲座”的讲台上

“这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也是对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革命性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杨天 | 上海报道

2009年9月25日，当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第一次走上上海奉贤中学“通识讲座”的讲台时，学生们频频提问：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读书，会不会影响考试？像您这样在专业领域领先的学者，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8个月后，当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在同一个讲台讲“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这种听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学术的法学讲座时，下面学生的提问让郑成良颇为吃惊：“您怎么看最近的赵作海误判事件”、“您认为法律的源头是邪恶的吗”，等等。

很难通过相距8个月的不同提问来判断奉贤中学的“通识讲座”是否已经成功，然而从中得出的模糊印象已令发起人之一的邓正来感到欣慰。

“哪怕因为这样的渠道，因为讲座中的一两句话，使一个学生受到触动继而改变他之后的人生轨迹，（“通识讲座”）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邓正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0年6月14日，奉贤中学最后一堂“通识讲座”结束。自去年9月起，该校每双周周五下午取消原有常规课程，改由高校教授主讲“通识讲座”，内容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到法学、民族学，乃至军事常识，所有高一学生及老师均到场参加，高二学生则在教室通过校园电视台收看讲座。

讲座人选由奉贤中学委托复旦大学高研院组织安排。一学年里，前来上课的教授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桑玉成、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复旦高研院哲学教授顾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等等。

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的“合谋”

“我们欢迎得不得了！大学教授很少能到中学来，我们自己去请又怕攀不上。”奉贤中学副校长金继波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现在正积极筹划，把高二年级与大学的理工科实验室建立起联系。”



奉贤区位于上海远郊，距离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42公里。由于在上海最南端，又被称为南上海。奉贤中学是奉贤区的前身奉贤县的重点中学，如今虽位列市级重点，但“县中”的历史和郊县的位置令其上海同等级高中里稍显弱势。

据多位大学和中学教育工作者介绍，在中学开展通识教育，并将其作为制度化固定下来的，奉贤中学很可能是国内第一家。

“奉贤的传统就是‘敬奉贤人’。”金继波说。传说孔子弟子言偃曾来此地讲过学，后人便以“奉贤”二字名地，以示敬仰。

该校校长季洪旭早有拓展中学课程的计划，某次饭局中遇到邓正来，邓的女儿正在读高中，他对中学教育的种种问题有一肚子想法和意见。两人越聊越欢，一拍即合，很快制定出由复旦大学高研院牵头组织，在奉贤中学推行通识教育实验的计划。

“我们与奉贤中学建立这个合作项目，是希望推进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改革试验，引导教育体制真正回归教育与学术。这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也是对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革命性探索。”邓正来说对本刊记者说。

他们决定将通识教育实验范围暂定在高一。“一来高一学生高考压力还没那么大，课业负担不太重；二来他们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也许会因此产生更多自我发现和规划。”邓正来说，“每两周才占用一个下午，不会耽误中学生正常课业，但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原来我们也过着政治生活”



奉贤中学“通识讲座”上的学生们

“政治生活是因集体生活而起，集体生活中难免有时碰撞出火花，各种矛盾、难题、困境便层出不穷。政治生活便研究此类问题，为复杂的集体生活进行‘整理’和‘清洗’……看看今日的领导者，‘贿赂案’、‘桃色事件’等新闻层出不穷，领导者们尚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人’，又怎敢说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人’呢？……”

奉贤中学高一(4)班的学生季睿婕在听了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桑玉成教授的讲座“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之后，写下这样的感想。

而她的同班同学王欣玥的心得是：“以前，我一直认为政治生活离我很遥远，是属于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与我们平凡人无关。直到那天，我才了解，原来我们也过着政治生活。”

在另一场颇受男生欢迎的讲座“军人、军队、军衔”后，高一(6)班的顾辉得出以下思考：“古时的斯巴达拥有绝对强大的军队，我相信他绝对有压制战争的实力，而他选择的则是战争！因此，我觉得要压制的不是战争，而是一种思想。正因为要生存的自私，人类才会建立所谓的军队。”

“一直以来，我们培育出的学生视野狭窄，现在有机会与高校教授们面对面，对于学生扩展知识面和独立思考很有帮助。”金继波说。据他介绍，每场“通识讲座”后都有学生踊跃提问，一开始，问题还总是围绕在课业压力和应对高考上，逐渐地，学生们的一些问题让他都感到些许意外。

比如，听完一场关于政治学的讲座，同学们追问：“执政党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如何消除不平等？”听完一场关于民族学的讲座，学生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少数民族被汉化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问题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向何处去？”

有些学生从小背到大的观念是错误的

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2009年已轰轰烈烈发生过一波。不过那是在高校领域。

彼时学者甘阳在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为目的。新生入学后通过不分学科的四年时间，修读古汉语、古希腊史诗、拉丁语等课程，并完成一个独立研究课题。

“通识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这种人需具备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能清晰地沟通思想的能力；能做适切明确判断的能力；能辨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美国哈佛大学1945年发布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大概是最早对“通识教育”作出清晰定义的文本。

此报告也被中国的大学借鉴。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已经有100多所国内高等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无论实效如何，至少都设置了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学分。但正如甘阳在某次讲座中谈到的，“通识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往

往无疾而终，一开始热闹了几年，最后就无声无息”。一旦进入实践层面，一些实际问题就会突显，比如，通识教育常常流于形式，最后反而把专业教育也耽误了。

“通识首先应该是给受教育者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把握。”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校长，郑成良对“通识”二字如此理解。他认为通识教育应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包含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类基础课程；二是比较宽口径的专业课。“通识教育并不是完全排斥专业教育，但是专业划分不宜太细。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应该学习的还是最基本的知识和方法。”

国内高校目前流行的方式是在大学本科前两年推广通识教育，尽量不分学科，上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基础课，后两年则主攻专业。但大学老师们往往发现新生们对普通常识缺乏了解，甚至有些学生从小背到大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单单去纠正这些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观念就花去大量时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内历史教材常常以王朝代替中国史，把汉族以外的政权称作“外族入侵”或“异族入侵”，那么当同一个版图中同时存在好几个政权时，比如北宋、南宋时期，同时存在的那些政权不算中国人？“当然算——而我们教科书的表述是错误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大学教师，特别像我这样的中国史教师，讲一讲从历史的角度，我对中国史怎么看，至少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参照吧。可以让学生了解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有问题，有很多非历史的东西。所以在中学开展通识教育是有一定好处的。”朱维铮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高中阶段为适应高考制度而实行的文理分科，郑成良、朱维铮都坚决表示反对。“中学阶段应该是培养国民最基本素质的阶段，是一种国民教育。这时的学生对于未来(的专业选择)其实并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和成熟的想法。”郑成良说。在朱维铮看来，过早文理分科，会让中学生“变得越来越片面，越来越狭隘”。

从中学开始解决大学的问题

只是中学也有中学的难处。巨大的高考压力让绝大部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五百多人的大讲堂里，一眼扫过，一排排近视眼镜都在吊灯下反着光。

“李少将说军校的生活很严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时作息。其实他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奉贤中学高一(6)班的丁蕾在听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的军事常识讲座后写道。

奉贤中学是一所寄宿制高中，学习压力和生活管理十分严格。周五下午听通识讲座时，不少学生也会在笔记本里夹一张英语卷子，时不时从悠远的文史知识里抽出神来，考虑下某个完形填空该选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

对中学生而言，“高考指挥棒”仍然更“权威”

“高考考察的内容僵化呆板，学生只能通过大量训练去提高，这样的方式很难激发起对知识的兴趣。”在中学任教整整四十年的复旦附中语文教师黄玉峰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的中学教育思路堪称“专制主义坐镇”，完全训练学生迎合出题人的意思，限制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

作为通识讲座主讲嘉宾中惟一的中学教师，黄玉峰参加过高考命题，担任过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

黄玉峰在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尝试各种努力，带领中学生搞许多业余活动：听讲座，逛书店，观话剧，看展览，练书法，学国画，办刊物，编文集，每年还利用寒暑假带学生集体出游，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另外，他一有机会便邀请学者教授来复旦附中做讲座，戴厚英、萧功秦等作家学者曾来他的语文课堂上讲课。

在他看来，如果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扩展学生的兴趣，那么应付高考也绝不会落在别人后面。他带领的复旦附中文科实验班，四十五人中今年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另有多名学生被英美名校录取。由于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突出成绩，他还被复旦高研院破格聘为兼职教授。

“如今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虽然学制贯通，但在知识链和师资上存在严重的断裂。”邓正来表示。

知识方面，高中学习的课程，在大学几乎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专业。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与大学里的政治学专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师资上，大学教授不愿意

进高中讲学，高中教师也进不了大学讲坛，大学与高中师资间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不能有所借鉴和启发。

在邓正来看来，奉贤中学的通识教育实验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突破。

邓正来刚刚接受了浙江温州市一家乡镇私立中学的顾问职务，打算在那里也开展通识教育，邀请附近高校教授前往授课讲座。他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推广。

“我希望全国的大学都有这样的热情和使命感，找到‘姐妹高中’开设通识课程，从中学开始解决大学的问题。这不是慈善，其实是为大学本身负责。”